

The Symbol Theory

符号理论

〔德〕诺伯特·埃利亚斯 著

熊浩 高乐田 译

非
外
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Symbol Theory

符号理论

〔德〕诺伯特·埃利亚斯 著

熊浩 高乐田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理论/(德)诺伯特·埃利亚斯著;熊浩,高乐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5631-8

I.①符… II.①诺… ②熊… ③高… III.①符号
学—研究 IV.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757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符号理论

[德]诺伯特·埃利亚斯 著

熊浩 高乐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631-8

2018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定价:32.00 元

Norbert Elias

THE SYMBOL THEORY

Edited by Richard Kilminster

First published in three part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Kilminster,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89

First published as a book under the title *The Symbol Theory*, 1991

by Sage, London

Revised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2011

by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as volume 13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Norbert Elias

Copyright © 1989, 1991, 2011 by Norbert Elias Foundation, Amsterdam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iepman A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中译本根据都柏林大学出版社 2011 版译出

诺伯特·埃利亚斯（1897—1990）

vii

诺伯特·埃利亚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生于1897年，一生经历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其生活深受这个世纪的一些重要事件影响。埃利亚斯在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犹太家庭长大，“一战”的时候是一名士兵，在短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一名社会学家，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不得不逃离德国，以一名难民的身份在巴黎和伦敦度过了艰难的时期，他快到六十岁的时候，才在英格兰得到一个大学的教职。1962年，已然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在加纳教了两年的社会学，随后回到欧洲又度过了25年，这期间，他一直从事教书和写作，活跃于欧洲的好几个国家，直到1990年在阿姆斯特丹去世，享年93岁。

埃利亚斯的青年时代在西里西亚的弗罗茨瓦夫（当时属于德意志帝国，现在是波兰的布累斯劳）度过，这个被呵护的青年时期因为“一战”爆发被德国陆军征兵戛然而止。复员后，埃利亚斯在弗罗茨瓦夫大学学习医学和哲学，于1924年毕业，撰写了哲学博士论文，但

是很快他就严厉批评说，如果不能认识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对代际学习过程非常重要的话，哲学家就是失败的，并因此最终认为哲学并非一门学科。1922—1923年的严重通货膨胀时期，埃利亚斯不得不做了一段时期的生意。回归研究后，他选择了海德堡大学的新兴的社会学学科。他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兄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手下工作，跟年轻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也有合作，后者当时在知识社会学上声誉鹊起。1930年，曼海姆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席，埃利亚斯成为他的助理。这个社会学系跟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一个校园里，但是两者在知识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

viii

在法兰克福，埃利亚斯写了一篇关于现代欧洲早期的宫廷、侍臣和宫廷文化的论文（这篇论文让他获得了在德国大学任教的讲师资格）。由于纳粹在1933年初获得了政权，这篇论文在随后的35年内都没有发表。埃利亚斯不得不离开德国，先是去了法国，然后到了英格兰。在“二战”早期，他因为在敌国身为外国人而被拘押了大约八个月，不过后来还是成为英国公民。埃利亚斯的母亲在奥斯维辛遇害，“二战”中和“二战”后，埃利亚斯给成人教育讲课，过着惨淡的生活。他帮助他法兰克福时代的一个朋友S.H. 福尔克斯（S.H. Foulkes）创立了集体分析——后来成为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流派。最后，在1954年，他被聘为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后来升为高级讲师。1962年到1964年，在正式退休之后，埃利亚斯去了西非，在加纳大学当了社会学教授——这是一段生动的经历，他搜集了大量的非洲艺术品。从1960年代中期起，埃利亚斯还是德国和荷兰的客座教授。从1978年到1984年，他在比勒菲尔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担

任永久驻地讲师。他也两次去美国进行短期访问，在纽约、波士顿和印第安纳的布卢明顿讲课。莱斯特是埃利亚斯主要的家，直到1978年他搬去了阿姆斯特丹，并于1990年8月1日在那里去世。埃利亚斯的国际声誉直到他漫长一生的最后阶段才来到。1977年，他是法兰克福市颁发的著名的特奥多尔·阿多诺奖的首位获得者；1988年，他是欧洲亚马菲奖的首位得主；比勒菲尔德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德国和荷兰都授予他国家勋章。

埃利亚斯在他流亡时期的早几年就完成了他最负盛名的著作《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该书于1939年由瑞士一家流亡者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开始默默无闻，30年后再版的时候其伟大之处才被认识到。1998年国际社会学联合会举办的一次投票中，这部书位列20世纪最重要的十本社会学著作之列。埃利亚斯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都饶有兴趣，进而发展出诸多方向上的文明化进程的理论。终其一生，他详细阐述了一套关于知识和科学增长的社会学理论。为了“在哲学的绝对主义和社会学的相对主义的两难之间游刃有余”，他总是试图为人类知识寻找一个稳固的基础。他率先让社会学研究体育，在艺术和文学方面，他的写作也颇有洞察 ix 力。这些作品共有的线索是：人的个体情感和思想是如何嵌入社会相互依存的纽带之中、并且如何随着这些纽带长期的结构性变迁而变化的。

在《文明的进程》之外，埃利亚斯的15本著作和绝大多数文章都在他正式退休之后出版了。这些作品中有些最初是用英语写成的，有些是用德语撰写的。由都柏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埃利亚斯著作集》（*The Collected Works*）囊括了他出版的所有作品，包括以前的很多非英语作品。

埃利亚斯用英文写成的《符号理论》的主要文本，此前以不同的形态出版过两次。它最早分三期发表在1989年的《理论、文化和社会》(TCS)杂志上，1991年，作为该杂志的系列出版物之一，塞奇(Sage)出版社把这三部分合并出版了单行本。¹在杂志上发表时，埃利亚斯延邀我担任此文的编辑，我和他深入地讨论了手稿。我的职责是让文本更加结构化，更清晰、更易读，并在杂志上撰写了一篇简介。在单行本中，我单独撰写了一篇对此书的编者说明。²

1990年4月，埃利亚斯仅仅写了个简明的开篇，然后就忙其他事情去了，直到1990年6月中旬，《符号理论》将出版单行本，他才

1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 2 (1989), pp. 169–217; 6: 3 (1989), pp. 339–83; and 6: 4 (1989), pp. 499–537; *The Symbol Theory* (London: Sage, 1991).

2 Richard Kilminster, 'Editor's note to "The symbol theor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 2 (1989), pp. 163–7; and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Elias, *The Symbol Theory*, pp. viii–xxv.

认真地着手为此书撰写一篇全新的导言，但是这篇导言尚在零散的状态，他就去世了。这篇未完成导言的部分内容已经在 1991 年版的书中出现。在现在的这个版本里，我想有可能（原因容后再说）把那些未能整合到埃利亚斯生前出版的文本里的片段恢复出来。在这个探寻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埃利亚斯晚期的很多工作内容，这些知识也有助于解说此书的特色。

此书的原始手稿写于 1980 年代晚期的阿姆斯特丹。第一份手稿完成于 1988 年夏末，用一行半的字距打印了 160 页纸。由于 TCS 的主编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急于在 1989 年早些时候的杂志上发表《符号理论》，埃利亚斯和作为编辑的我都有时间上的压力。这部庞大的打印手稿只有几处分段，还集中在前几页上。文章一开始有编好号的章节次序，但是这个次序在第二章之后就没有了。整个文本看起来没有统一形态：数个重叠的主题在多个不同的层面上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还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在原始材料中已经提出过的一系列主题和争论。除了凌乱的形态之外，这本文稿似乎顺理成章地落入了一种模式，幸好我能够跟埃利亚斯就此充分讨论，这有助于我理解这一模式。这部看上去没有定型的手稿其实很明显是有系统也有结构的。在编辑文章之时，我注意到了常用的语法、拼写、句法和标点的习惯。我也确定了所有的分段和第二章之后的章节编号的位置，这些在我提交书稿的时候都呈现出来了。埃利亚斯希望保留他一开始使用的章节编号的格式，这是他很多早期文章中的习惯做法，而不是使用我曾建议的副标题格式。在现在这个版本里，这些编了号的章节已被重新标明以更符合习惯，同时我也给它们配上了标题。我想这些标题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不过，考虑到文中这些重叠交织的主

题，一些主题会在不止一个章节里加以讨论。

在完成了第一版手稿的编辑之后，我在 1988 年 9 月把它交给了埃利亚斯。他对某些章节进行了修订，尤其对前 25 页进行了扩充式的修改。在 1989 年 3 月出版之前，我再也没有机会重看一遍这部书稿，因此这本书前面几章分段更多是埃利亚斯式的。在分段上，他可能听取了某个研究助手的建议。而在我分出的一些章节和我对他英语的些许订正上，他显然接受了我的做法。不过我曾建议他删掉的一些重复的段落，他还是留在文中，对此他也没有回复理由。就目前我所知，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要紧的决定，也跟他的坏脾气和健忘无关。很可能与他逐渐糟糕的视力和听力以及他频繁更换的助理团队有关，这点我稍后再谈。

xiii 在埃利亚斯进行了增补和修订之后，《符号理论》的文稿变得很庞大，以至于费瑟斯通认为它太长了，无法在 *TCS* 的一期上全文发表。另外，到 1988 年 10 月，准备出版的时限之时，我交给埃利亚斯的文稿他只完成第二稿大约一半的修订工作，因此他错过了 1989 年第一期杂志的出版时间。本来文稿会分两次出版，但随着篇幅越来越长，费瑟斯通决定分三次出版，这一点上我跟他意见相同。埃利亚斯因此把时限设定在 1989 年 5 月号的杂志上出版第一部分。在 1989 年 2 月 23 日写给我的信中，埃利亚斯附上了一份整个文稿的复印件（他刚刚完成并寄给了费瑟斯通），他写道：“这么晚才完成我很抱歉，不过幸运的是，最后时刻我发现了一个错误，幸好改正了它。我很感谢你的帮助，如果你还发现有重大的错误，随时告诉我。”如果从众所周知的埃利亚斯的每日工作习惯来看，《符号理论》的文本本身从某个角度来说并非终极的版本。它只是在不断积累的众多草稿、新的起

句、改写、插叙和增补之中形成的众多版本中的一个。它只是文稿不断演化着的众多时刻之一瞬，在此时刻，埃利亚斯为了出版而不得不拿出书稿来。³

符号理论：概要

在关于此书稿的对话中，埃利亚斯告诉我，《符号理论》与他一系列知识社会学的著作有关，这些著作包括《时间随笔》、《卷入与超脱》以及主要结集在《论文集一：关于知识和科学的社会学》中的一些写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文章。⁴尤其是其中的片段《对大进化的思考》和《关于人类及其情感》一文，跟本书密切相关。⁵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33年，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埃利亚斯参与了与卡尔·曼海姆有关的德国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的兴起。1930年到1933年，他是曼海姆的助手之一。这个团体的研究核心乃是意识形态和思想流派整体上的社会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在《生命的思考》中，埃利亚斯称当时他发现把意识

3 埃利亚斯对他文稿的占有欲曾被提到过，见 Stephen Mennell,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rev. edn (Dublin: UCD Press, 1998), p. 20.

4 *An Essay on Time* (Dublin: UCD Press, 2007 [Collected Works, vol. 9]);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Dublin: UCD Press, 2007 [Collected Works, vol. 8]); *Essays I: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Sciences* (Dublin: UCD Press, 2009 [Collected Works, vol. 14]).

5 Norbert Elia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evolution: two fragments', in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pp. 179–233; 'O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motions: a process-sociological essay', in *Essays III: On Soci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Dublin: UCD Press, 2009 [Collected Works, vol. 16]), pp. 141–58.

态的伪装和政治神话揭露出来“令人愉快”。⁶不过，虽然这个学派显然形塑了他，但埃利亚斯自己的研究却走向孕育出这个传统的另外一个方面，这在《符号理论》一书中可以看到，大部分明显展现在重写的导言中，在全书中也隐约可见。埃利亚斯把他称之为社会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那部分研究项目向纵深和广度方向拓展，以取代个人主义化的知识哲学。这就涉及人类知识发展的一种长期社会学路径，它包含权力、社会冲突、竞争以及位居它的解释性工具核心的利益。在《符号理论》中，埃利亚斯把所有这些都放到一个更长时段的进化时间尺度中。知识社会学的精髓，在于埃利亚斯的讨论模式能够把传统上属于哲学、形而上学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转换到另外一个层面。由于它们被纳入更宽广的社会学框架，就一个话题（在此是人类社会的进化维度）的传统谈论方式就显得站不住脚了。在本书中，我们将跟随埃利亚斯经历那些传统的二元对立：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物质-精神，自然-文化，形式-内容，存在-意识。

《符号理论》一书（尤其在导言中）特别显著地讨论了主观-客观二元论的局限性。他把这一对立回溯到强烈的个体（*homo clausus*）自我经验，已经深度文明化的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人具有这种典型特征。他的基本观点是，希望我们忘掉传统的、僵硬的、高度抽象化的以及常常是形而上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试图在进化的框架和时间尺度内描绘一种超然的理想化的人。换句话说，埃利亚斯致力于在进化框架内用一种历时方法，把他称之为符号的“存在方式”
xv (*mode of existence*) (pp. 54, 157-158) 论证为人类习得的各种交流

6 Norbert Elias, *Reflections on a Life* (Cambridge: Polity, 1994 [*Interviews and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Collected Works, vol. 17]]), pp. 36-7.

手段。

埃利亚斯迎面就探讨了常被回避的一个难题：知识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他在社会学层面上动态地谈论这个问题的方式，读来引人入胜，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唯心-唯物二元论（见第五章“大脑记忆图像”的讨论和第六章）。埃利亚斯超越了传统的“自然-文化”、“存在-意识”以及“结构-文化”二分，把它们放到从人类物种进化到社会发展这一整合层级（*level of integration*）的进化连续体中看待。⁷在埃利亚斯看来，人类的状况是嵌入从无意识的进化过程一直到更高层次的进化过程这一社会发育之中的。⁸人类在这一过程中幸存下来，与之紧密相关的是，符号形成了。

在这一组著作中，埃利亚斯总结出一种现在被归为某种现实主义

7 埃利亚斯使用的“整合层级”这个概念来自于现代进化生物学。见 Joseph Needham, *Integrative Levels: A Revaluation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Oxford: Clarendon, 1937)。埃利亚斯对此更全面的论述，见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evolution’。另见 Terence J. Wassail,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i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eeds, 1990; Richard Kilminster, *Norbert Elias: Post-Philosoph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7), ch. 6; Stephen Quilley, ‘Ecology, “human nature” and civilising processes: biology and sociology in the work of Norbert Elias’, in Stephen Quilley and Steven Loyal (eds), *The Sociology of Norbert Eli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tephen Quilley, ‘Integrative levels and “the great evolution”: Organicist b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Norbert Elias’,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0:4 (2010), pp. 1–29; Catherine M. Borchert and Adrienne L. Zihlmann, ‘The ontogeny and phylogeny of symbolising’, in Mary Le Cron Foster and LucyJayneBotscharow (eds), *The Life of Symbols* (Boulder, CO: Westview, 1990), pp. 15–44。

8 《符号理论》跟以下著作一起读会更有益：埃利亚斯的论文《人类境况》（*Humana Conditio*, in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and Humana Conditio*, Dublin: UCD Press, 2010 [Collected Works, vol. 6]）。另见 Kilminster, *Norbert Elias*, ch. 1。

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学模型。他充分利用了《符号理论》中这一关于科学的理论。在埃利亚斯的这一模型中，每一学科都是把宇宙某一相对独立的整合层级（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使用这些术语的科学哲学家而言）。这一模型对这些学科研究的主体提供了更易区别的结构化的概念以及相应的不同研究方法。对传统的“主观-客观”二分法而言，埃利亚斯的这一模型（它给科学⁹假设了一个等级序列）提供了在经验上可行的另一种路径。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埃利亚斯认为进化论并非只有达尔文一个版本，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完备，只代表了这一学说的早期阶段。在与我的讨论中，埃利亚斯表示他的目的是调和有关人类动物性的认知中的两种极端观点。一方面，某些行为学家和社会学家有某种还原论观点，认为人类就其本质而言是猿。另一方面，哲学和宗教观念则认为人类和动物界之间有条鸿沟，人类有“灵魂”或者“精神”。对于这些总是取其一端的和评价式的因而总是导向要么还原论要么神学的观点，埃利亚斯试图提供一种新的模式，从理论上清除这些障碍。《符号理论》明确了一个主旨：大进化是所有学科（包括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共时框架，从这个框架出发，有望得到一套全新的、更现实可靠的人类自我印象。

埃利亚斯对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自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被称为现代综合进化论学派的作品。这些学者包括朱利安·赫胥黎

9 “科学的等级序列”的观念跟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有关，埃利亚斯在《社会学是什么？》（*What is Sociology?* London: Hutchinson, 1978 [Collected Works, vol. 5], ch. 1.）一书中表达了对孔德的敬意。

(Julian Huxley)、李约瑟和 C.H. 威丁顿 (C.H. Waddington)。¹⁰20 世纪 40 年代, 由于整体进化过程中存在着“突现的”、不可还原的阶段, 因此整合层次有等级之分的观念在生物学思想中已经非常流行。现代综合进化论的鼓吹者们给埃利亚斯分享了人类社会是“突现的”现象这一非还原主义的观点,¹¹ 不可还原为之前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层面。当时流行的其他一些理论假定包括, 人类是进化从低级过程到高级过程的一个飞跃, 人类的符号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埃利亚斯从这些学者那里获得了灵感, 同时也跟他们保持了距离, 因为他在他们的思想中整合了坚定不移的社会学方法。他对如下方式有一种深刻的社会学家的感觉——使人联想到知识社会学 (Wissenssoziologie)——人们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制度化规训出来的服从会显著地形塑他们对世界 (这里指生物现实) 的观察。在《符号理论》中, 为了给他的文明的进程、整合层级、科学异化和符号形成等理论补充长时间段的进化理论基础, 埃利亚斯从生物学家那里借用了他所需要的那部分现代综合进化论。¹²

10 见编者引用的这些作者的作品索引, 第 181-185 页。

11 在《符号理论》以及他的其他关于知识和科学的社会学著作中, 埃利亚斯刻意避免使用“偶发的”(emergent)和“偶发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的字眼, 很可能因为它们有着形而上的暗喻, 因此, 他更倾向于描述整合层面每一阶段都有着“阶段特殊属性”。见 David Blitz, *Emergent Evolution: Qualitative Novelty and the Levels of Reality* (Dordrecht; Kluwer, 1992), pp. 150-1; and Kilminster, Norbert Elias, p. 178n。

12 为了简单评判埃利亚斯在《符号理论》中的思想能在何种程度上与当代进化生物学研究进行比较, 包括随机基因漂移, 基因、亲缘体、种群和物种的代际相传, 以及以人类为中心的共生网络的认知, 见 Quilley, 'Ecology, "human nature" and civilising processes', and 'Integrative levels and "the great evolution"', and Kilminster,

在参与指责进化决定论或者目的论的论战中，埃利亚斯（也包括这组著作的其他处）对基本不可逆的生物学进化和可逆的社会发育进行了根本的区分。恒星的生命循环和人类社会体的发育不是同一回事：跟恒星不一样，现代人类社会有可能倒退到更早阶段（也许回到封建社会关系时代）。鉴于此，埃利亚斯经常把文明化和反文明化进程放在一起谈论。在这个伟大的社会-自然发育框架里，埃利亚斯把人类使用符号进行交流的技术能力看作自然界盲目的创造进程的一个超凡成就。人类通过习得的知识来驾驭行为的能力，让他们相对于其他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只能在极有限范围做到这一点的物种获得了极大的进化优势。在第三章里，埃利亚斯把这一优势称为人类在符号上的解放。他认为，人类群体之所以存活下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获得了跟现实一致的知识。¹³ 如果这样的知识不够丰富的话，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的妨碍。

从这一观点出发，埃利亚斯为人类的未来启示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在第九章末尾以及在导言里，他一直在讨论这一点）。他又一次回到

（接上页）Norbert Elias, ch. 6. 关于埃利亚斯对包括进化维度在内的社会发育的长期观点的著作，见 Johan Goudsblom, Eric Jones and Stephen Mennell,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Economic Growth, Social Process, and Civil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Johan Goudsblom, *Fir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Allen Lane, 1992); Johan Goudsblom and Bert de Vries (eds), *Mappae Mundi: Humans and their Habitats in a Long Term Socio-Ecological Perspective — Myths, Maps, and Model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与现实一致”是埃利亚斯关于知识和科学的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见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Dublin: UCD Press, 2007 [Collected Works, vol. 8]), and *Essays I: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Sciences* (Dublin: UCD Press, 2007 [Collected Works, vol. 14])。

了他一直以来的辩论目标：康德先验哲学的不足。埃利亚斯尤为用力批评的一点是，康德以范畴去限制知识的做法隐含了一种失败论的腔调，此论调与笛卡尔的怀疑论一起，已经使我们对世界的真实性产生了瘫痪性的怀疑。他声称那些哲学化的思考方法（这种方法怀疑个体认知者之外任何事物的存在）是“现代性苹果里的蛀虫”。对埃利亚斯来说，这些教条学说对科学的发展形成了一股破坏性的逆流。它们只能妨碍解决人类面临的严重认知问题——目的是形成一种与现实一致的、对全球层面上人类自我发展下一阶段的相对超然的理解，这种理解能增强我们扼制社会螺旋式下降的能力。

复原埃利亚斯的导言

1991年版的《符号理论》中有埃利亚斯本人没有写完的一篇导言，在1990年8月1日去世之前，他本人正在撰写这篇导言。在埃利亚斯葬礼前的1990年8月5日，在他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里，他的一名长期助手鲁道夫·尼基夫（Rudolf Kijff, 1956—1994）把一份打印稿给了我，这篇导言就是基于这份打印稿。作为埃利亚斯的好友，尼基夫被当时阿姆斯特丹埃利亚斯的圈子认为是埃利亚斯的首席助手。他告诉我，这份打印稿代表了埃利亚斯去世前最完善的版本。我对它做了些不太重要的编辑性修订，并在出版的文本末尾注明了“未完”字样。相应的德语版作品集里的《符号理论》中也未加修改 xix 地收录了同一篇导言的翻译稿。¹⁴

14 *Symbol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1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3]).